

第三卷

中国共产党

黄楚芳 方向新 主编

与中国农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中国共产党

董建文 王树明 主编

与中国农民

●黄楚芳 方向新主编

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农民

第三卷

方向新 刘心语 吴家庆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黄楚芳,方向新 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12

ISBN 7-5438-3171-6

I. 中... II. ①黄...②方... III. 农民-问题-研究
中国-现代 IV. D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273 号

责任编辑:李雄伟

装帧设计:廖 铁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

(全三卷)

主编 黄楚芳 方向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3.25

字数:1,069,000

ISBN 7-5438-3171-6
D·472 (全套)定价:108.00 元

目 录

卷首语	(1)
-----	-------

第一章 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转折	(5)
----------------	-------

1.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农村	(5)
2. 农村改革之风已起于“青萍之末”	(14)
3. 中央工作会议反思农业发展	(21)
4. 三中全会实现指导思想转移	(31)

第二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39)
------------------	--------

1. 艰难突破，安徽人敢为天下先	(39)
2.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激起千层浪	(46)
3. 包产到户在争论中前行	(54)
4. 邓小平的表态与中央的明确说法	(60)
5. 联产承包制的突破性进展	(66)
6. 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	(73)

第三章 打开商品经济的大门	(80)
---------------	--------

1. “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	(80)
2. “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	(85)
3. 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	(93)
4. 农村供销合作社体制的初步改革	(100)

- 5. 农产品市场的培育 (107)
- 6. 扶持发展农村专业户 (112)

第四章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19)

- 1.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119)
- 2. 社队企业的调整与整顿 (126)
- 3. 乡镇企业新局面的开创 (132)
- 4. “星火计划”推动乡镇企业上新台阶..... (139)
- 5. 横向经济联合“造大船” (144)
- 6. “促进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 (151)

第五章 稳定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 (160)

- 1. 关键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160)
- 2. 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169)
- 3. 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177)
- 4. 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185)
- 5. 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193)

第六章 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202)

- 1. 农业要走高产优质高效之路 (202)
- 2. 出路在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209)
- 3. 抓紧实施科教兴农战略 (214)
- 4. 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223)
- 5.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的新方略 (229)
- 6. 推进非农产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238)

第七章 农村经济走向市场化..... (246)

- 1. 不断深化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246)

2. 依靠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棉花资源	(253)
3. 建设高效率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259)
4. 逐步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265)
5.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271)
6. 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	(279)
 第八章 向绝对贫困宣战	(286)
1. “三西”地区打响国家扶贫第一炮	(286)
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291)
3. 发起“八七”扶贫攻坚战	(298)
4. 全社会动员实现扶贫攻坚目标	(308)
5. 突出重点, 扶贫到村到户	(314)
6. 21 世纪消除贫困新方略	(321)
 第九章 增收减负奔小康	(328)
1. 增收, 也要减负	(328)
2. 标本兼治治“三乱”	(334)
3. 费改税: 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	(342)
4. 广开农民增收的渠道	(351)
5. 领导农民奔小康	(358)
 第十章 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366)
1.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	(366)
2.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出台	(371)
3. 广泛推行村务公开制度	(378)
4. 村民自治由示范走向深入	(384)
5.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392)
6. 不断提高农村干部素质	(400)

第十一章 努力建设精神文明·····	(407)
1. 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 ·····	(407)
2. 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	(414)
3. 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 ·····	(421)
4. 把发展农村教育放在重要位置 ·····	(428)
5.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 ·····	(435)
本卷主要参考文献·····	(444)
后记·····	(448)

卷首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命运的历史性转折。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对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实事求是的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的实际结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农村改革犹如滚滚春潮汹涌向前。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创造了十分丰富、极为宝贵的经验。

把农民问题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且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正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高度，通过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变化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了正确处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应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 80% 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 80% 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研究和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前进和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把这一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12 亿多人口，9 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坚持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关键是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地提出了两条指导性原则：一是在经济上，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二是在政治上，要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准则。并认为这是政治上正确对待农民的、巩固工农联盟的重大问题，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依据这一基本准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业微观组织的再造，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国家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农村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支持和鼓励农民从实际出发，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发展新型的联合与协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新旧生产经营体制的顺利转轨。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的农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出现了超常规增长，为随后出现的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经济体制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取得显著进展。以 1982 年新宪法规定建立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为标志，民主政治建设逐步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历经多年的努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村民自治为重要特征，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地民议事、村务公开和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对保障农民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道路。这是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更高的阶段，为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的重要手段。以市场为取向的农村改革，在确立农户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鼓励农民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生产，进入流通领域。为此，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随之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核心，主要是由市场形成价格，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农民获得的农业剩余明显增加，投资能力增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相应提上了议事日程，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着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之中，从1992年开始，农村改革进入稳定基本政策，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深化的新阶段，农产品市场和农村要素市场日益发育、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向前扩展。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农业生产能力稳定地提高，基本结束了农产品供给绝对短缺的局面，农村经济的增长方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其深层意义在于可以彻底改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大推动我国生产社会化、政治民主化、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的问题。

坚持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向贫困宣战的政策，发起了一场扶贫攻坚战。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扶贫开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0年的3000万人左右，贫困地区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坚持以经济建设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把实现小康作为农村发展的主要目标，把增产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明确提出广辟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历经多年

的努力，这一工作业已取得明显的成就：抑制了农民负担增长过快的势头；农民收入来源渠道逐渐拓宽，收入水平也显著提高；农民在奔小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基本达到小康初始化的水平。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农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这是深入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需要。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农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根据农村发展的要求，坚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跃上新台阶，尤其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不断走向深入，道德建设力度加大，文化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素质的提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用浓墨重彩绘制了一幅农村变革的伟大历史画卷：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农民生活从总体上由温饱迈入小康，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有了深刻的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只要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实践“三个代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不动摇，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富裕、文明、民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出现在 21 世纪的中国大地上。

第一章

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转折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会议。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完成了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拉开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序幕。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顺应民心，正确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的思想，开启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命运的历史性转折。

1.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农村

自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农村，党和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基础相当落后，广大农民的生活仍处于贫困的状况。

“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村的形势，在一份当年留下来的文件中可见一斑。文件的基调，固然是充分肯定成绩，但从中也可看出诸多问题。1977年11月召开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的“汇报提纲”——《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对

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如下描述：

一曰“速度慢”。粮食生产递增率，“三五”计划期间为4.5%，“四五”期间降到3.2%。1956年到1976年的20年间，粮食增长和人口增长平均每年都是2%。也就是说，20年人均粮食没有增加。

二曰“水平低”。所谓水平低，就是产量低、劳动生产率低、粮食人均占有量低、商品率低这“四个低”。具体表现是：1976年粮食平均亩产为201公斤，一个劳动力全年生产粮食只有1000公斤左右。1976年每人占有粮食307公斤，与1956年相同。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的商品粮只有70公斤。

三曰“不平衡”。1970年到1976年，粮食生产每年增长2.7%，其中增长较快、提供商品粮较稳定或近年来由调入变为调出粮食的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山西7省，每年增长率低的为3.5%，高的达到7.1%，平均为4.8%。而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浙江、江西和黑龙江7省，平均都只有0.4%。有几个省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比前几年下降了。如果各省每年都增长4.8%，全国就可多产粮食350来亿公斤。不平衡也反映在提供商品粮上面。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内蒙古、贵州，多年来由调出变为调入粮食。四川、黑龙江、吉林、广东、江西过去提供商品粮较多，近年却大幅度下降，有的已调不出粮食。四川有“天府之国”之称，粮食由调出变为调入，仅1976年就调入6亿公斤。浙江作为第一个粮食上《纲要》的省，也吃起了返销粮，棉花、油料的人均产量比1957年还低。

四曰“不全面”。棉花产量已徘徊11年，油料产量停留在1952年的水平，糖料从1973年以来没有增长，林、牧、渔业的发展也都不适应需要。

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份《汇报提纲》时指出：“这种状况，与当前国民经济大发展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很不适应。如

不迅速改变，三年大见成效，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步伐，以及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变成空话。”^①

上述四个问题的分析，主要是立足于国家和城市市场需要的角度，从农民所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能否满足市场之需要入手的。如果再换一个角度，主要考察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通过发展生产得到什么经济实惠，生活有无改善，甚至能否吃饱肚子，则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会更为突出。1977年6月被党中央派往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的万里，在后来回忆起当年农村情景时仍然心情沉重，他说：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啊。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②

这种情况并非存在于个别地方。据统计资料，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2公斤；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50元以下的占27%，40元以下的占16%；人均口粮，旱粮地区150公斤以下的生产队占19%，水稻地区200公斤以下的生产队占18%。也就是说，全国约有1.4亿农村人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942页。

^② 张广友等：《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百年潮》1998年第3期。

口处于半饥饿状态。

农村的现实是严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农民已经到了困苦不堪的境地！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中国农业仍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运行，神州大地还看不到多少春的气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应该说对农业问题还是非常重视的。他曾明确指出农业发展速度缓慢，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充分认识加速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但他为中国农业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明显地不能切中病根。

这一剂错误的“药方”就是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普及大寨县。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加速发展我国农业，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大寨，要真学大寨，高质量地学大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认识，解决真学大寨还是假学大寨的问题。”^①

1976年12月，粉碎“四人帮”后仅两个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多达5000余人，包括全国2000多个县的所有第一书记。会议以揭发批判“四人帮”为动力，检查总结各地普及大寨县运动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进一步动员全党，充分发动群众，鼓足更大干劲，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华国锋亲自向大会作报告，号召全党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943页。

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会议明确提出：到 1980 年把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

把学大寨运动与揭批“四人帮”联系起来，昭示着当时中央领导人决心系统执行“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左”的政策的基本内容。在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农村中“左”的错误继续得到坚持，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口号又重新推出。

比较典型的的就是鼓动蛮干，不讲实效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每年冬春全国都有上百万干部、上亿农民参加农田基本建设。1975 年以来，平均每年都要平整土地 8000 万亩，改造坡耕地 1000 万亩，扩大灌溉面积 2400 万亩。这虽然在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大会战的形式也助长了好大喜功和“一平二调”的倾向，使农民不胜其负担。

1977 年 7~8 月，国务院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到会的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以外，还邀请了 200 多位地委第一书记和 400 多位县委书记，形成了 1200 多名代表参加的大会。会议的开法也不寻常，先是组织南方各省区代表到江苏省苏州地区参观学习，然后南、北方代表会集山东参观，再云集北京开会讨论。这次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年大干。要求各地开展比赛，迅速掀起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到 1980 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各地纷纷组织大会战，不惜人力、物力，继续盲目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项目。不少地方机械地推广大寨经验，大搞“水平梯田”、“人造小平原”。1977 年 10 月底统计，全国已经铺开的工程达 39 万处，投入的劳动力达 8000 万人之多。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仍不满足，